

文化意蕴与时代价值——中文创意写作视域下《给阿嬷的情书》的重构电影叙事赓续乡土温情

■文许胜利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南枝代写”这一独特职业为切口,将沉寂的文献还原为鲜活的充满温情的乡土记忆。蓝鸿春导演的“潮汕三部曲”以方言为代表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爸,我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形成了“方言电影”剧场效应。《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出高浓度的爱与坚守,创造性使用方言进行质朴的情感叙事,成为方言电影的一个奇迹。观众希望通过看电影看到“自己”的类似的经历和故事,开始寻找与自身人生、经验等相似的更贴近生活的作品。

AI时代,创造性地使用方言,让方言有新的担当和使命。“方言是情感的容器”,对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作用。《给阿嬷的情书》传达了爱是可以超越时空的,爱是智慧的化身。爱是人性的闪光点,是信任未来的能力。爱是创造力,能创造奇迹。

“小切口见大历史”的叙事价值

(一)《给阿嬷的情书》表达了中国人善良、勤劳、真挚、朴素的情感和高贵的品质。《给阿嬷的情书》建立在潮汕人“下南洋”的特定时代背景之上,传递了“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的故事,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阿嬷”已成为一种触动了中国人的情感纽带的、潜藏的文化基因的社会现象。方言是“底色”。扎根乡土、乡愁上的目光,质朴而真正的爱情。影片以“更小的切口”——从一个家庭、从“阿嬷”的小视角切入,这种“小切口见大历史”“以小故事讲述大情义”的叙事手法,再加上片中真挚却又留有留白的真情实感的表达,获得无数观众的共鸣。

(二)方言叙事,承载侨乡历史文化记忆价值。《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并不复杂:孙子晓伟远赴泰国,寻找已失联四十年的阿公,在寻亲过程中,以“侨批”这一连接故乡与海外的重要媒介,揭开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庭往事,讲述“侨乡女性”“离散经验”地方性叙事故事,一封跨越山海的家书,从“等待叙事”向“共同体叙事”的转型,牵出两代人的寻根之旅,就是他们对故人、故乡思念的寄托,用最纯粹的故事力量打动观众。《给阿嬷的情书》给观众带来的体验,让观众觉得这“都是在写我嘛”,比如“扛红旗”的漂亮姑娘,泛黄侨批、门框、细雨、青苔,“家与乡土”的精神内核,患难见真情,这些都是让观众共情的电影叙事元素。

方言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有着特定的文化价值

(一)方言本身是一种“叙事武器”。方言在银幕上“发声”讲述着真实

的故事,影片借用“方言标签”表达朴实的地域文化,在个体的血脉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游子”离开家乡,在城市打拼,方言就成为了“自家人”的代名词。

普通话作为精准、标准、方便、实用,易于交流的民族的“通用语言”,有着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而方言蕴含着特定地域的生活质感与文化密码,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潮汕话是古代汉语活化石,让观众领略了方言之美。《给阿嬷的情书》守望与善意,独特的传统意境,那浓浓的乡音中的泥土味、市井气、烟火气的气息,唤醒一个人的记忆。

“乡愁”是永恒的话题,乡愁记忆是“心灵刚需”。《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讲述中国人至真至善情感的华语电影”。善良的南枝总是无私地付出,不图回报地帮助淑翠,这是她一种善良的情感本能。就南枝而言,爱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患难见真情,影片真实、具体、细腻的细节,传递了最真挚的情感,值得每一个人去观看。

(二)《给阿嬷的情书》巧妙运用声音民族志进行叙事书写。

《给阿嬷的情书》采用“离散+情书(家书)+乡音=内耗的治愈”的方式,表达“阿嬷是我们童年记忆里最温暖、最柔软的存在”的真实情感。阿嬷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让很多观众动容,也反映出中国人骨子里的“情义观”,书信守望、无声的付出与成全,是社会最暖的底色。爱是人性的闪光点,爱是光,爱是信任未来的能力。善良与担当绽放人性的光辉。《给阿嬷的情书》以情感的大主题,乡愁的视角与情感,获得大众的情感共鸣。乡愁的视角与情感,在情绪里内耗,日常市井生活元素,“乡愁”与乡愁记忆,“影旅融合”效应创造了“情绪锚点”。

承载中华民族情感认同与文化记忆的社会价值

(一)承载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社会价值。

《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进入了大众视野。“批”在福建、广东不少地方的方言中就是“信”的意思,在闽南语、潮汕话中意为“信件”。而“侨批”,又称“银信”,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银信包裹”,即(华侨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凭证的合称)侨批通常包含家书并附带汇款。它既是信,也是汇款单,闽南人称之为“钱信合一”,兼具情感沟通与经济支持的双重功能,承载着海外华侨华人的绵绵思念与家国情怀侨批文化中那份重情守义的文化记忆,更有中国人一诺千金的以情义跨山海的珍贵的精神品格。“侨批”维系家庭经济,也承载情感认同与文化记忆。

《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载体,彻底摒弃浮华套路,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聚焦祖孙温情、乡土羁绊,扎根乡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朴素镜头、真实叙事、细腻情感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的亲情故事。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母语是家国感和文化认同的根源性因素之一”。

(二)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影片以侨批为叙事线索,在片中撒视频频出镜,成为贯穿其间特殊的温情符号。日常琐碎并不简单,好的叙事需要情感是自然流露,不矫揉造作,运用平淡的细节,缓缓地讲述。《给阿嬷的情书》是一个关于善意、真情的故事。影片是深耕现实题材,镜头朴素、叙事、情感细腻,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实践。题材厚重化质、民族特色鲜明、地域风情明显、人文情感纯真、地域风貌彰显。

2013年,“侨批档案”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其历史意义与价值进一步得以彰显,从侨乡民间记忆升格为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阿嬷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让很多观众产生共鸣,也反映出中国人骨子里的“情义观”,书信守望、无声的付出与成全,是社会最暖的底色。“侨批”是跨越山海的家书,蕴含着特殊的情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海外“游子”对家国故土最深情的牵挂。《给阿嬷的情书》于2026年6月18日在马来西亚100多家影院正式上映,以其充满人情味的具有代表性的充满温情与共鸣的真实叙事,做人要有情有义、诚信善良,重信守诺呈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的基本特征,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和“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范本”。

(作者单位:长江职业学院)基金项目: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教学改革课题(课题批准号:2026JGYB148)成果。

以戏剧表演技巧提升电影角色的感染力

■文/吕昊楠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加快,中国影视产业逐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的深度转型。与此同时,观众审美认知的迭代与内容消费需求的分层演进,使表演艺术的创作精度成为决定电影作品艺术质感与传播效度的核心变量。戏剧与电影作为表演艺术两大核心形态,虽在传播载体与呈现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底层创作逻辑与人物塑造规律始终存在深度的内在关联,对戏剧表演技巧在电影创作中的转化路径展开系统探讨,能够为电影角色感染力的提升提供可参照的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为影视表演体系的完善补充跨媒介的研究视角。

一、戏剧表演技巧融入电影创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两者融合的内在逻辑戏剧与电影两种艺术形态在呈现空间、传播方式上的显性区别,时常遮蔽二者在人物塑造层面共享的底层规律与创作逻辑,而对共通内核的梳理,正是探讨技巧迁移可能性的前提。就创作本质而言,无论是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还是镜头前的电影表演,其创作载体始终是演员的身体与精神,最终目标均是通过有机的行动过程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技巧构成角度来看,戏剧表演训练中关于情绪记忆、信念感建立、人物小传构建的基础方法,本身不依附于特定的传播媒介,其对演员身体控制能力、情感感知能力、逻辑构建能力的训练目标,与电影表演对演员综合素养的要求高度重合,多数核心技术能够在调整呈现尺度的前提下完成跨媒介迁移。

(二)戏剧表演技巧对电影表演的补位价值电影创作的工业化生产特征与镜头语言的特殊表达逻辑,使演员表演时常面临创作周期碎片化、人物状态非连续、呈现尺度难把控等现实问题,而系统的戏剧表演训练能够从多个维度为电影角色表演的品质提升

提供支撑。就人物情感的深度维度而言,戏剧表演体系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方法,能够帮助演员在有限的镜头篇幅内建立起完整的情感逻辑。饰演《中国医生》中重症医学科主任这一角色的演员,依托内心深度挖掘的训练方法完成了对职业身份背后个体情绪的精准感知,使角色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的隐忍与坚守具备充足的内心支撑,避免人物形象陷入职业符号化的表达局限。从角色行为的逻辑层面看,戏剧训练中对贯穿行动线的梳理方法能够为角色的每一次选择与行为建立起符合人物性格的内在动因,《驴得水》中张一曼这一角色,通过完整的行动逻辑串联起所有行为选择,使看似跳脱的表达始终统一于人物的核心特质之中,角色的悲剧性结局也因此具备更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在大量采用长镜头叙事的现实题材作品拍摄过程中,接受过系统舞台训练的演员往往能够在连续的拍摄过程中维持稳定的人物状态,在情绪爆发的关键段落呈现出具备层次递进的表演张力,无需依赖后期剪辑的拼接即可完成完整的情感表达,为导演的镜头调度提供更充足的创作空间。

二、戏剧表演技巧在电影创作中的适配性运用策略

(一)内心体验技巧:筑牢角色的情感根基以情绪记忆法、有机天性法则为核心的内心体验训练路径,在电影创作中需要结合镜头语言的微观表达特征进行适配性转化,才能真正成为支撑角色情感感染力的底层创作方法。演员在前期筹备阶段应依托人物小传完成角色前史推演与性格成因溯源,借助情绪记忆法唤醒个体生命经验中与角色情感状态相契合的感知片段,据此将舞台表演中常以外动作作释放的情感能量转化为支撑面部微表情变化的内在情绪基底,使特写镜头下的眼神流转、面部肌肉的细微颤动都具备可追溯的情感逻辑

与心理动因。此外,演员还可运用体验派技法——“假使的魔力”与规定情境代入训练,通过对角色所处环境、事件前提的层层假设完成专属心理场域的构建,在非顺序拍摄与绿幕虚拟拍摄的碎片化创作语境中维持稳定的角色信念感,无需依托完整的现场调度与对手互动即可快速进入对应的情绪状态,使跳拍场次中的人物反应始终贴合统一的心理逻辑。这种向内收敛的训练转化路径,能够让镜头的微观捕捉获得充足的情感支撑,避免特写画面陷入空洞的表情复刻,为角色感染力的持续生成筑牢深层心理基础。

(二)语言表达技巧:强化台词的情感穿透力戏剧表演中经过长期训练形成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为电影台词的质感提升提供方法支撑,但其呈现方式必须结合电影的声音创作逻辑完成尺度调整。舞台表演中为适配剧场空间形成的气息控制、共鸣调节方法,在电影同期录音的创作环境中可转化为更加精细化的声音控制能力,帮助演员根据角色身份、情绪状态调整声音质感与气息状态,使人物语言具备鲜明的性格标识与真实的情绪底色。对台词节奏、重音、停顿的处理同样需要适配镜头表达的特点,如演员可参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言语行动的创作原则,在贴近生活的表达基调中暗藏设计感,通过细微的语速变化、气口停顿传递角色未言说的潜台词内容。在《中国医生》中,袁泉对文婷一角的塑造便印证了这种跨媒介转化的实践价值,其在告知患者家属救治结果的段落中并未刻意强化语言的戏剧张力,反而以克制的语速与经过精准设计的重音落点,将职业身份约束下的不忍与歉疚藏于平实的语句背后,让台词既符合生活化的真实质感,又具备足够的情感承载能力。

(三)肢体表现技巧:丰富角色的身体叙事系统的戏剧肢体训练能够帮助演员建立起对身体的精准控制能力,

这种能力在适配电影不同景别的表达要求后,可成为角色身体叙事的重要载体。如源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有机造型术与性格化体态构建方法,本是舞台表演中完成人物外部形象整体性塑造的核心技巧,这套方法迁移至电影创作后,能够在全景镜头的呈现中快速传递角色的身份特征与精神状态。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有着多年话剧舞台深耕经验的胡歌便借助这一技巧完成周泽农的外在形态设计,他通过含胸收肩的习惯体态、略显滞重的步幅节奏,使人物在进入画面的瞬间便立起逃亡过程中疲惫警觉的底层逃犯形象,无需借助台词补充即可完成初步的人物身份与生存状态建构。此外,戏剧表演中手部动作、面部微表情的精细化控制训练,能够满足电影创作中近景与特写镜头的微观表达需求,帮助演员通过细微的肢体变化传递复杂的内心情绪。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在塑造高位截瘫角色时,借助眼睑颤动幅度、嘴角收放节奏与眼球转动速度的精准控制,将角色强硬外壳下的绝望与脆弱藏于不易察觉的微表情之中,在特写镜头的近距离呈现中搭建起无需依赖对白的叙事路径。

三、结语

戏剧表演体系中成熟的内心构建、语言控制与肢体塑造方法,经媒介适配性转化后可从情感深度、逻辑完整性与细节丰富度等多个维度强化电影角色的艺术感染力,为 人物形象突破符号化表达局限、建立可被观众感知的生命质感提供创作支撑。未来可进一步深耕戏剧表演与电影艺术两类表演形态的融合路径,不断丰富本土电影表演的创作方法体系,为中国电影实现艺术水准与产业能级的双重进阶筑牢坚实的表演艺术根基。

(作者单位: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管理系艺术管理专业)

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本土建构与国际传播价值

■文/马海婷

在全媒体时代与数字视听文化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学作品作为重要的“IP”源头与文化根基,正通过现代视听语言经历着深度的跨媒介重构。从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科幻史诗《三体》,到引发海内外热烈反响的《繁花》《人世间》《我的阿勒泰》,文学影视化改编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形式转换,演变为连接民族记忆、时代精神与全球文化对话的深层现象。文学影视化改编既是一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重塑,也是一次中华文明的跨文化对话。二者互为表里,唯有深植本土根脉、完成主体性的现代建构,才能真正彰显其超越地域限制的国际传播价值。

一、根脉与转译: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本土主体性建构

文学作品向影视媒介的跨范式转译,首要在于立足本土文化场域,完成民族审美与时代精神的现代重塑。这种本土建构并非对原著文本的文字照搬,而是在精神内核、空间风物与叙事范式三重维度上的深层沉淀与视听再造。

首先,精神内核的当代凝练,实现了对现实主义母题与东方审美基因 的深层续接。影视改编必须精准萃取文学作品中的东方伦理底色与哲思内核。例如,电视剧《人世间》在改编过程中,摒弃了悬浮化的戏剧冲突,将“家国情怀”与“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伦理叙事深深烙印于平民史诗之中。视听语言将原著中厚重的苦难叙事转化为“韧性生存”的生命赞歌,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齐家等精神基因的现代化表达。这表明,本土主体性建构的核心在于对现实主义母题的深度挖掘,使视听叙事具备扎根大地的精神厚度。

其次,空间风物的美学复刻,依

托视听语言对地域文化与时代图景进行了具象化重塑。文学的“地缘性”在影视改编中被转化为直观的视听符号,完成了对区域文化与特定时代景致 的艺术再造。剧集《繁花》通过极致的镜头语言、光影构图与方言原声,将文字间隐秘的海派风情与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质感高度复刻。而根据散文改编的《我的阿勒泰》,则以电影级画质将自然地理与民俗风情转化为具有东方意境的视听诗篇。此类改编借由视听媒介赋予文学空间以灵动的生命力,实现了地域文化符号的具象呈现。

最后,叙事范式的本土化适配,促进了大众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学的融合。严肃文学的精英性与影视媒介的大众性之间往往存在着天然张力。优秀的影视改编善于在保留文学原著思想深度的同时,契合现代观众的共情范式与视听习惯。这种融合体现为对文学文本解构后的类型化重组,既避免了因过度通俗化导致 的艺术弱化,又规避了因绝对忠实原著而产生的传播壁垒,实现了严肃思想表达与大众视听审美的 高度契合。

二、“破圈”与共鸣:跨文化语境中的国际传播价值提升

优质的本土建构是跨文化传播的坚实基石。在海外传播语境中,扎根于本土土壤的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正通过提炼人类共同价值、重构流媒体传播渠道与映射真实国家形象,实现国际传播效能的全面提升。

首先,从“文化折扣”到“文化共情”,在于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视听提炼。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降低“文化折扣”,寻求不同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剧版《三体》在忠实于原著人文关怀与宏大科幻构想的基础上,将对宇宙规律的探索、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考等全人类共议议题置于叙事核心。作品通过具象化的视听特效与严密的逻辑,将东方哲理与现代科幻融合,成功跨越了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理解障碍,实现了从符号输出向深层情感与思想共鸣的跨越。

其次,海外本土化传播的渠道重构,依托流媒体时代构建了视听IP的全球化网络。文学影视化赋予了传统文本更强的网生适应力与全球分发渠道。借由国际主流流媒体平台,中国文学改编剧集得以实现全球同步上线。这种模式打破了以往中国文学作品仅停留在海外学术界或小众书架的局限,直接接入全球大众视听消费网络,推动中华文化从文字出海向视听跨海的深度演进。

最后,重塑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完成了从文学图景到国家形象的跨媒介映射。海外受众通过影视改编作品中的烟火气与时代感,得以直观感知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图景。《我的阿勒泰》中展现的民族和谐与自然之美,以及《人世间》中呈现的中国普通家庭五十载的历史变迁,均以极具感染力的视听语言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人文风貌与时代脉搏。这种基于文学底座的视听表达,有效打破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刻板印象,实现了从“看剧”到“知华”的认知跨越。

三、机制与路径:推动“文学-影视”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策略

面对当前改编实践中偶尔出现的“重流量轻文学”“过度魔改”及“产业链断裂”等现实阵痛,必须在机制建设与路径创新上协同发力,构建高水平发展的新格局。

在内容源头层面,针对影视与文学前期脱节、IP粗暴贴牌的现象,应

建立联合孵化机制。推动编剧团队早期介入文学创作,打通严肃文学、网络文学与影视创投的前置产业链,从源头保障改编作品的艺术品质与视听转化潜力。

在创作主体层面,面对部分作品缺乏跨媒介理解、视听转译生硬的问题,应强化人才培养与敬畏意识。培育兼具文学素养与国际视听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引导主创团队提升对原著人文底蕴的敬畏心,精细化处理翻译与海外配音制作,提升跨文化传播的精准度。

在产业生态层面,面对单一版权交易导致出海衍生链路短的困境,应积极构建全产业链出海模式。以影视改编为杠杆,带动原著翻译出版、海外文旅联动及周边衍生开发,形成“文学IP+影视剧集+文旅衍生+海外出版”的联动出海生态,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增值。

结语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阔实践,文学影视化改编不仅是文艺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引擎,更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新型战略载体。从文学图景到视听语汇的跨媒介转译,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化主体性塑造与文明互鉴的深层实践。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与产业布局中,唯有深刻把握本土建构与国际传播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以文学底蕴为基,以视听创新为翼,才能防止改编走向虚浮与同质化。扎根中华文化的文明根脉,提炼全人类共通的 精神共鸣,中国文学影视化改编方能 在全球视听舞台上持续绽放具有中国气派、东方神韵与世界共鸣的艺术光彩。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